

20世纪俄罗斯 档案文件

新经济政策
是怎样被断送的

(二)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

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
（五卷本）

第一卷 1928年4月6—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第二卷 1928年7月4—1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三卷 1928年11月16—2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四卷 1929年4月16—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第五卷 1929年11月10—1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二卷

1928年7月4—1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Как ломали нэп.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ов ЦК ВКП(б) 1928—1929 гг.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атерик»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Фонд Александра Н. Яковлева), 2000.

© В. П. Данилов, А. Ю. Ватлин, Е. Е. Кириллова, Л. Н. Малашенко, О. В. Хлевнюк.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введение, примечания.

本书中文版权取得俄罗斯国际民主基金会授权,由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

图字:01-2007-0782 号

责任编辑:魏 华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马 杰 责任校对:吴海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二)/[俄]A. H. 雅科夫列夫 主编 李方仲
宋锦海 李永庆 译 李方仲 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A. H. 雅科夫列夫院士 主编)

ISBN 978-7-01-006794-0

I. 新… II. ①雅… ②李… III. 经济政策-研究-俄罗斯 IV. F1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3537 号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二)

XIN JINGJI ZHENGCE SHI ZENYANG BEI DUANSONG DE

[俄]A. H. 雅科夫列夫 主编 李方仲 宋锦海 李永庆 译 李方仲 校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53.25

字数:92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6794-0 定价:11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内部发行)

ISBN 978-7-01-006794-0



9 787010 067940 >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主编

A. H. 雅科夫列夫院士

编辑委员会：

A. H. 雅科夫列夫（主任）

E. T. 盖达尔 B. П. 科兹洛夫 B. A. 马尔丁诺夫

C. B. 米罗年科 B. П. 纳乌莫夫 E. M. 普里马科夫

A. H. 萨哈罗夫 Г. H. 谢沃斯季亚诺夫 H. Г. 托米林娜

C. A. 菲拉托夫 A. O. 丘巴良 A. A. 雅科夫列夫

本卷编辑出版委员会：

В. П. 丹尼洛夫 О. В. 赫列夫纽克 А. Ю. 瓦特林 (以上为主编)

М. С. 阿斯塔霍娃 Г. В. 戈尔斯卡娅 И. М. 扎科莫尔基娜

Е. Е. 基里洛娃 Л. П. 科舍廖娃 В. С. 列瓦诺维奇

Л. Н. 马拉申科 Н. В. 穆拉维约娃 Л. А. 罗戈娃娅

Н. А. 西多罗夫

李方仲 宋锦海 李永庆 译

李方仲 校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翻译出版委员会：

主 任：李铁映

副主任：戴秉国、李慎明、李静杰（常务）

委员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钊贤	王钢华	乌传袞	冯育民	李方仲	李京洲
李慎明	李静杰	汪 宁	郇中建	张达楠	赵永穆
赵仲元	赵国顺	徐 葵	黄书元	鲁 桓	戴秉国
魏 华	臧乐安				

序

1928 年七月全会

1928 年 4 月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速记记录已在前一卷(《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第 1 卷,莫斯科 2000 年版)发表了,从那时起到 1928 年中央七月全会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国内局势进一步尖锐化和“非常”政策在强化。首先面临的仍然是粮食收购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对待农民的整个政策问题。在评定四月全会的结论和最初造成的后果的时候,我们指出了,通过的决议在形式上谴责“冒进”的同时,又强硬地要求保证完成不可能完成的粮食收购计划,这里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政治局 1928 年 4 月 25 日《关于加强粮食收购的指令》和在此前由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在中央会议上向地方领导人提出的要求,再度给农村施加了压力¹。

关于 1928 年 4 月 20 日至 6 月 1 日收到的、来自农民的声明和请求,有一份概述材料,全俄执行委员会收到的这份材料里有一个总的结论:在春季推行的粮食收购、征税和捐献、推销国债运动中,农村被“目无法纪的浪潮”所笼罩。当然,写出这个概述的人无法知道,这个定义将更适用于 1930 年春天的局势,他们所描述的“仅仅是”最初的猛烈打击……这些打击的具体表现是这样一些“过火行动”:“根据第 107 条,凡运不出 500 普特粮食就追究责任的事件已经不计其数,而在 5 月的运动中,已经是因为几十普特的粮食就要判罪,剥夺自由和没收财产了”²(而根据正式规定,农户的商品粮储备至少达到 2000 普特时,才会采取这样的措施)。

在暴力越来越盛行的条件下,采用“过火行动”的机制开始显露出来了。推动它的主要力量是已开始实施的《俄联邦刑法典》第三章,那些“纪律涣散、粗枝大叶、无所事事和玩忽职守的国家的、社会的(党的?——编者注)和集体机关的”工作人员运用了第三章。关于农村的暴力源于何处,编写向全俄执行委员

会递交的农民声明和请求的概述材料的作者完全肯定地得出了结论:“在有了来自上面的这种压力的情况下,基层机关对谁也不会客气了:他没有时间,他也不想因为玩忽职守被送上被告席”。除此以外,农民也逐渐开始懂得了这一点。那个概述说:“一些声明说出了这样的思想,认为地方上的这种粗枝大叶是与中央通了气的”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官方语言里,用“地方上的粗枝大叶”解释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中的“过火和歪曲”,并不是在1930年才出现的,而是从1928年春天,在斯大林的“来自上面的革命”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农村的暴力和向私人贸易的进攻导致了城市保障系统的完全瓦解、大量排队现象的出现以及自发实行凭证供应制度。联共(布)中央新闻部的通报指出,由于粮食的匮乏,关于饥荒、行将来临的战争和推翻苏维埃政权、关于国内各地饥饿的暴乱和罢工的“反苏”谣言不胫而走。“宣传失败和不信任共产党员”的情况,在政权视为自己支柱的工人中间时有发生。工业企业纪律涣散,工人们为寻找面包而离开车间。“罢工情绪”在增长,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的确导致了罢工。在城市里,群众性的示威和游行越来越多,起主要推动作用的,经常是失业者——城市居民和进城市打工的农民中最有社会爆炸危险的那部分人。1928年4月19日,两千名群众摧毁了列宁格勒的劳动交易所,5月10日,大约三千人在莫斯科交易所举行暴动,殴打警察,摧毁商亭等。仅自5月20日至6月15日的这段日子里,各城市的劳动交易所就总共发生了13起冲突。最严重的城市动乱发生在塞米巴拉金斯克。5月15日,数千名群众举行了游行并闯进了市执委会大楼。城里的商店被捣毁⁴。

像平时一样,当局十分关注军队,它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由于农村暴力,军人从亲戚那里得到大量信件,这些信件详细地描述了紧急状态的种种可怕的情景并发出了求救的呼吁。在军队里,像官方文件里所说的“农民情绪”,对当局的不满,对来自家里的消息和信件的广泛议论,越来越强烈。军队领导加强了检查,7月16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将社会异己分子清除出军队的指令⁵。

充斥了全国以及国外出版物的无数传言中,也有关于政治局里斯大林与李可夫分裂的传闻⁶。细心的观察家的确能够发觉,苏联领导人们甚至在公开的讲话里用语也有所不同。然而,苏联领袖们自己认为最好是否认存在分裂。1928年4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显然是在回答伏罗希洛夫所说的关于党的某次会议收到有关分裂问题的便条时,写道:“我想,是那些经常潜入积极分子会议

的、(隐蔽的)反对派分子在写李可夫派和斯大林派的问题”⁷。

斯大林向自己消息灵通的战友发出的这个声明很能说明问题。斯大林知道,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占主导的情绪是要求“团结一致”,他怕公开地成为分裂的发起者。大多数工作人员担心领导层出现新的冲突,不仅是因为国内正在形成紧急局势以及对整个政权的威胁在不断加剧,而且还因为,上层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使得党的官员们自己的政治前途成为问题,上层分裂意味着必须站到某人一边、被卷入斗争、冒失败的风险。

然而,在四月全会之后,政治局内的对抗变得更为激烈,扩大到了越来越多的新领域。引起布哈林与斯大林之间直接冲突的,似乎是非常具体的和甚至是局部的问题,是关于“工业品出口”的问题。1928年5月17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米高扬提出的进口计划草案。布哈林的疑惑到了极点,为使自己所持的反对态度能够得到严肃的对待,他给斯大林写了便条:

“我极其害怕下列情况。

米高扬的三张便条总的倾向是:(1)强化工业品出口;(2)放弃粮食(谷物)出口。接着便是:(1)我们要拖长国内的商品奇缺状况;(2)我们要在国内商品奇缺的情况下迫使工业为出口服务;(3)我们将不采取措施发展农产品(谷物)的出口;(4)农业国家从事工业品的出口。

取代这种做法的应该是:(1)加强工业化,面向国内市场;(2)实现农业的工业化,提高它的生产率(并使谷物生产机械化),为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而把农产品出口作为方向。

没有农业的某种积累就不可能有任何集体化,因为机器是不可能白白得到的,而一千个木犁也换不来一台拖拉机。

我非常害怕这里存在固有的毛病:建议搞的不是包括农业工业化在内的工业化,而是工业化脱离农业和谷物生产的稳定性等。

这项政策将只会加剧巨大的困难”⁸。

而斯大林的回答是:“对。米高扬有这种(不正确的)倾向,他有这种想法并不是由于他有意识地采取了这样的方针,而是由于某些(我不知道的)经验主义的实际考虑。但这并不可怕,因为在这里不是米高扬在决定问题。斯大林”⁹。

现在就这个独特的出色文件评论几句:布哈林对斯大林式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批评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致斯大林别无选择,只得同意(“对”)并把一切推到米高扬的身上,说他有了“不正确的”倾向。但是,布哈林显然不知道突然出现的“加紧工业品出口”的倾向的真正内容,因此不能评价它的真实含义。斯大

林则相反,他非常了解这里提到的倾向来自什么样的“经验主义的实际想法”,它的内容是什么。1928 年做出的种种计划要求加紧从苏联出口,这些计划实际上是在 1929 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这里指的是出口木材,其中包括依靠广泛动用犯人采伐木材。

过了一些时候,布哈林又给斯大林写了信,晚些时候他自己在 1929 年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上确定,写这封信的日期是 1928 年 6 月 1—2 日。信中谈的是重新考虑农村政策的总方针问题:“我认为国内外局势非常严重。我想,我们需要考虑出一个完整的计划,特别是关于销售新收成的时间……如果我们进入一个新收获期却同农民的关系极其尖锐,我们就会在新的运动中又有失败的危险……我们的非常措施……在思想上已经失败了,变成了一种新的、与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路线不同的政治路线……”。这封信主要要求的是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政策。布哈林问道:“如果一切问题在于富农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承认是神话的 9 亿又该怎么办? 而如果我们粮食压根就很少的话,那么,富农怎么来为我们‘调节’呢? 如果所有的生路在于集体农庄的话,那么,哪儿来钱去搞它们的机械化呢? 总之,说我们的集体农庄应该在贫困和分散的情况下成长是否正确呢? 吸引小额存款的方针是否还有效或是已经过时了呢? 鼓励个体经济的方针是否还有效或者已经过时了呢? 你过去批评过的伊万·尼基托耶维奇·斯米尔诺夫的错误,那么,在有了新的事实的情况下,他又错在哪里呢? 等等,等等”¹⁰。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土地政策的关键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将决定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党和国家活动的方方面面和性质。布哈林提出的问题已经包含了完全明确的答案,因为它们涉及了一点,那就是正在推行的政策已经出现的和正在迅速发展的矛盾——与国内真实状况的矛盾。到了 1928 年 7 月,甚至过去不知道有关谷类饲料平衡情况的那段历史的人都开始明白,“我们的粮食压根就很少”,富农的“罢粮”不会产生粮食收购危机,然而,斯大林旨在同富农作斗争和搞集体化的方针已经开始在左右总的路线,把发展合作社(“吸引小额存款的方针”)以及“推动个体经济”撂在一边,甚至取消了。与此有关的还有 И. Н. 斯米尔诺夫 1925 年提出的关于开始农民经济集体化(绝非是采用斯大林式的方法)的建议。斯米尔诺夫那时受到了猛烈批评,并且由于加入了“联合反对派”,于 1927 年年底被开除出党。

上面提到的信件尽管问题提得尖锐,最后结束时仍然是呼吁和解:“我向你声明,我不会也不想打架。我太了解打架会意味着什么,而且是在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所处的这种条件下。我请你现在好好考虑一点:让代表大会能够安安

静静地进行,不要在这里再制造更多的裂痕了,不要再制造流言蜚语的气氛了……我们把代表大会结束了……我也将准备没有任何打斗、无声无息和没有任何斗争地离去,随便到什么地方去”。¹¹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要在夏天举行,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的非正式首领¹²,坚持要求召开这次会议,而且这有可能成为宣传他的政治路线的合适讲台,所以援引这次大会是一个很有力的论据。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状况促成了在1928年春夏这段时间里,斯大林和“右派”是在继续用隐蔽的打击互相交手,借助于别人的手在行动。被提上中央六月全会的种种有关共产国际的情节,在这场隐蔽的冲突中开始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根据共产国际的章程,它的代表大会应该至少两年举行一次¹³。在党内发生尖锐冲突的条件下,政治局里由斯大林和布哈林领导的大多数不愿意为托洛茨基或者季诺维也夫提供国际组织的舞台。所以,例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一再被推迟,这引起了外国共产党的不满和流亡国外的新闻界的嘲笑。在1925—1927年的政治稳定时期,共产国际显然不是联共(布)领导关注的中心。如果说“联合反对派”总是没完没了地向共产国际呼吁,坚持要让俄国革命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的话,那么,斯大林则宁肯保持距离,扮演“国家主义者”的角色,不倾向于在国外进行冒险的实验。从1927年中起,在他的倡议下,政治局开始了一场把共产国际的特使从苏联驻国外的代表机构中剥离出去的运动,批评外国共产党人在财政问题上和秘密活动问题上漫不经心。¹⁴

4月23日,根据斯大林的报告通过了一个很长的《关于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建议联共(布)的领导人在参与外国共产党的事务时要最大限度地保密。只对布哈林有例外,在季诺维也夫被从共产国际排除掉之后,他满意地接受了扮演世界革命战略家的角色——在布尔什维克的官员们看来,和外部世界打交道是一种特别令人敬佩的工作。除此之外,领导共产国际执委会意味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政治局里的“日常事务”,这不能不让倾向于从事理论工作的布哈林感到称心。

但是到了1928年初的时候,“世界革命”的各个战场上的局势极不顺利。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继续迫害共产党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起义没有成功造成的,把苏联的范例定为方向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也正经历着尖锐的危机。欧洲的共产党人也没有能打入群众,在绝大多数国家里依然是一些从属于莫斯科的左翼激进分子集团。世界经济在继续高涨,而苏联的报刊要写资本主义的危机和革命运动的又一次高涨变得越来越难了。区域性的社会和政治冲突被鼓吹得神乎其神,当成了无产阶级政变的先声(例如在维也纳发生的1927

年7月事件),结果是苏联的和共产国际的宣传家们被自己的乐观搞得越来越被动。随着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政党每一次的“背叛”,也就是说它们和自己国家政府的新的忠诚合作,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是世界资本的附庸和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退出政治舞台的提法就越来越失去了说服力。

相反,西方报刊转入了进攻,他们反复宣传外国共产党在财政上依附于莫斯科。在英国,当地的共产党人手里有莫斯科人民银行的账户,在发生了又一次丑闻之后,政治局的专门委员会抓了这个问题。这个委员会决定从苏联的机关里解雇英国的共产党人,招致了他们如此强烈的抗议,以至不得不“平息”局势——1928年6月2日,布哈林和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向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波立特做出答复的方案,坚持说委员会的结论是有根据的。¹⁵要通过共产国际新纲领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筹备召开的。

在共产国际的全部历史中,此前一直都在议论着如何制定纲领,把它作为20世纪的《共产党宣言》,若能成为这个纲领的作者,那就意味着可以加强自己作为主导理论家的优势,由此而来的是种种政治上的好处。布哈林在这些问题上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还在1922年,他就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草案,成为共产国际内部进行进一步讨论的课题。¹⁶制定纲领的工作实际上的最后收尾被推迟到了十五大粉碎“联合反对派”之后。1928年1月1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用征求意见的方式通过一个决定,成立内部的纲领委员会,成员是:斯大林、李可夫、莫洛托夫、瓦尔加和布哈林(就在同一天,通知了托洛茨基要把他流放到阿拉木图去)。只是在一个月之后,才通过了一个专门决定,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委托联共(布)代表团成员提出新的纲领草案的方案。

制定这个纲领的工作是采用了全体紧急动员的办法进行的。有意思的是,布哈林最初草拟的东西是在分析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的,而社会民主党在党的正式宣传中则被戴上了“理论上一文不值”的帽子。斯大林对这个问题意外地表现出了兴趣,他对这个文件展开地谈了自己的意见,提出了自己的文章结构¹⁷。斯大林很清楚,共产国际的纲领将不仅是一份政治文件,而且是一份树立个人崇拜的文件,所以在这条战线上,他也要加强自己的阵地。1928年7月,像加米涅夫证实的,布哈林曾说过,“在许多地方,斯大林把我搞的纲领弄糟了。他自己想在全会上宣读关于纲领的报告。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夺了过来。他非常渴望成为一个公认的理论家。他认为,他所缺的只是这一点。”¹⁸但是在准备联共(布)七月全会日程的时候,布哈林自己建议斯大林来做关于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报告(见补充材料4)。

在制定这个文件的最后阶段时,布哈林保持了平静并准备要合作:“斯大林提出的所有建议和修改(我没有收到其他同志的意见)几乎全都注意到了并吸收到文件中了”¹⁹,——他在4月3日随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写给政治局就这个问题组成的委员会成员的信里,就是这样写的。略过了一些时间,布哈林又同意了一个妥协——根据政治局5月7日的决定,纲领草案应该由布哈林和斯大林签名,提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²⁰

对比第一个和第二个方案就可以看出,布哈林依然是把重点放在了分析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各种进程上,从中得出了共产国际的战略和战术。由此得出了比较有伸缩性的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和保持世界革命的欧洲路线的提法。斯大林提到首位的是,苏联是“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雏形”,是“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无产阶级将来联合成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世界统一经济”的基础。这里说的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而是世界历史今后的进程将完全要取决于如何利用这个胜利的成果。

4月的草案和5月的草案的第二个不同,涉及的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政策基本原则”的阐述——实际上说的是如何解释“俄国的经验”,具体说就是新经济政策。布哈林的说法不仅是重复了,而且是发展了他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市场杠杆”的思想。“走向胜利的无产阶级应该在那些可以进行集中的和计划性的领导的生产领域之间,以及在有可能成为他手中的平衡手段的那些领域之间取得正确的比例。后者应该让个体发挥首创精神”。“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相互竞争的经济形式进行经济斗争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这些经济形式有可能会是平行发展的”。“在涉及城乡关系的领域里,无产阶级应该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和极端的慎重,绝对不要去破坏农民个人的活动动机,要逐渐地——通过农业的集体形式的示范和对它们的支持——用同志式的经营动机来取代这些动机。”²¹

4月方案中的上述所有引语都是引自递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纲领草案的。布哈林在一步一步地后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紧急召集的纲领委员会已经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胆量严肃地研究草案了。这个委员会召开了3次会议,斯大林一次也没有参加。布哈林向与会者解释了基本改变的意义。被叫到莫斯科的委员会成员简直就没有可能注意地阅读他所提交的文件,于是不得不相信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权威了。委员会提出的所有45条修改意见都带有编辑补充的性质,既没有涉及草案的结构,也没有涉及它的基本条款。

政治局里在讨论弗鲁姆金的信时发生了冲突,这也是按照类似的脚本发展

的。老党员、苏联副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 1928 年 6 月 15 日向政治局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写了一封信,请他们注意由于农村的非常政策形成的紧急局势。

弗鲁姆金在 1928 年 6 月 15 日的信里首先具体分析了农业的条件和“紧急状态”的致命后果。信里说道,“最近采取的方针导致中农群众感到暗无天日和没有前途。由于担心被划为富农,对改善牲畜和农具都失去了任何兴趣。农村中是一片压抑,这不可能不反映到经济的发展上来”。后来农村以及整个国家发展的全部进程证实了弗鲁姆金的实际结论是正确的:“……应该清楚的是,无论是从哪里得到的,每得到 100 万普特的粮食都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业化,而每失去 100 万普特的粮食又都会削弱我们”。

弗鲁姆金说,他是试图用自己的信“引起政治局注意那些成千上万的党员都在极其关注,每次相遇都会谈论……的事情”²²。弗鲁姆金的这番话的主要的政治意义也就在于,它是和已经广泛散布的情绪相通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明白这一点,所以马上做出了强硬的回答,用长官的训斥和政治上指责“右倾”和保护富农来偷换严肃的和实事求是的论证。

虽然我们不掌握任何证据,说明弗鲁姆金的行动和布哈林或李可夫有联系,但是显然出现这样的一封信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努力利用对这封信的讨论作为在政治局审议国内总的局势的理由。从布哈林对加米涅夫的讲述判断,领导集团曾决定把弗鲁姆金的信散发给政治局的所有成员并编写出一个总的答复稿。但是这种做法对斯大林不利。一方面,再一次讨论严重的社会经济局势有可能影响政治局委员中那些动摇的人的情绪。另一方面,协调一致的声明只可能是妥协性的,因此不会是像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强硬。6 月 20 日,斯大林不顾达成的协议,散发了自己给弗鲁姆金的答复,指控他保护富农²³,从而打破了布哈林的所有计划。布哈林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是赶紧轻轻地刺斯大林一下。“我们通过了指摘违反决议的决议。认为答复是正确的,但是不完全。我没有能继续支撑下去”,——布哈林对加米涅夫说。²⁴正如政治局会议的记录证明的那样,1928 年 6 月 25 日的确通过征求意见的方式通过了决定,认为“斯大林同志对弗鲁姆金同志的信的答复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并不完整。”²⁵这个决定本来就没有多大效果,而且还由于在当天(25 日)(无疑是和斯大林商量好的)莫洛托夫散发了自己的一份内容广泛的、支持斯大林答复的声明,效果就更被削弱了。这份声明也附在了政治局会议的记录上。²⁶

既然“右派”没有能争取到结合弗鲁姆金的信讨论普遍性的问题,他们也就只能组织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进行这样的分析了。布哈林对加米涅夫是这样谈

到这件事的：“1. 我要求讨论总的问题。斯大林不干：需要的是工业财经计划等等。2. 我给斯大林写信要求进行一般性的讨论。他跑来找我：布哈林，你甚至能够把大象的神经搞坏，但是他就是不同意讨论。3. 我写了第二封信——他把我叫到他那里去。他开始说：我和你是喜马拉雅山，其他人都不值一提。4. 我们去见‘七人小组’。一副野蛮的场面。他开始对我大喊大叫。我讲了他说的喜马拉雅的话。他叫道：‘你说谎。这是你编出来的，要让政治局委员们反对我’。我们不欢而散。5. 我没有松手地读 20 页的声明。莫洛托夫宣布说，这是反列宁主义的、反党的。斯大林说：有十分之九我可以接受。莫洛托夫走了。作为基础通过了。我去写决议。他们也一样。出乎意料地拿来了从我的宣言上偷来的决议。我做了 3 处修改。李可夫改了一处。全部一致通过了”。²⁷

托姆斯基在联共（布）1929 年 4 月的中央全会上完全证实了加米涅夫转述的布哈林的证词。他说，召开政治局的秘密会议讨论粮食收购决议这件事被长期推迟了，在最后可以召开这次会议的时候，提出来进行讨论的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提纲，布哈林提出了自己的文件，莫洛托夫表示反对，但是斯大林同意了“十分之九”。²⁸在为六月全会准备的材料中，保留了对这个问题上的各种不同的决议草案。在全会速记稿的补充材料里，我们也公布了布哈林最开始的决议草案，这是在“七人小组”上讨论过的那个草案，也是中断了编写的那个草案。

布哈林建议把包括个体农户的基本群众在内、全面发展粮食经济作为“经济政策最主要的指令之一”。坚决否定了“进一步采用非常措施”（见补充材料 11 和 12）。我们还要指出的是有一项硬性规定的条款，那就是必须既要和资产阶级的倾向，“又要和那些力图让非常性的和临时性的措施变成经常的或者具有长期方针性质、从而将威胁到工人和农民的基本群众的联盟事业的成分”“进行坚决斗争”，这是李可夫加进了决议的。²⁹

总的来说，从形式上看，可以认为政治局提交给党的七月全会审议的“联系到总的经济局势的粮食收购政策”决议草案是李可夫-布哈林集团的胜利。其中说到了“城乡之间分裂的危险”，说到个体经济“在很长时间将是国家粮食经济的基础”，承认了在推行 1927—1928 年的粮食收购运动中的错误，宣称不能允许再采用非常措施。有一个事实具有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决议里有具体的指示：禁止“巡查农户，非法搜查和各种破坏革命法制的实际做法”，禁止关闭集市，规定要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和加强向粮食地区运送工业品，等等。不难发现，这些建议实际上重复了弗鲁姆金的信提到的许多条款，而这是在不久前斯大林和他的同伙严厉谴责过的。

虽然在全会开始的前夕对全会的基本决议达成了妥协,政治局里存在深刻矛盾的消息还是透露到了党的高层官员中。全会的调子侧重了有关共产国际的各种情节,就把斯大林集团和“右派”相互关系中最痛的各点引到了一旁。日程上的前两项是曼努伊尔斯基通报共产国际的“策略性迫切”问题和布哈林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把这两项异乎寻常地分开了,而且对每个报告的讨论也是分开进行的,这也多少促成了上述情况的出现。不能排除的是,这样的程序是布哈林提出来的,为的是集中到理论问题上,避免指控日常工作中的错误。

曼努伊尔斯基是要承受猛烈批评的,他的讲话相当的淡然无色,着重点不是放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4年来革命进程总的状况上,而是放在了1928年上半年的各种事件上。说到的是新的“阶级对阶级”战术的最初结果,也就是共产党人拒绝和社会民主党结成竞选联盟和进行议会合作。报告里提到了所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陈词滥调:新的革命高潮的发展,“改良主义的领袖们的右转和群众的左转”,共产党本身的右倾危险,——这就谈不上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评价了。联系到共产国际的新策略,对德国和法国议会选举所做的分析堆砌了各种统计,显然是不符合革命进攻的精神的。甚至曼努伊尔斯基在共产国际的同事皮亚特尼茨基也承认,报告“过于理想化地评价了选举的结果”和进一步斗争的前景。

在讨论第一个报告的过程中,第一个打破沉默的是洛米纳泽。这个年轻的格鲁吉亚共产党员是斯大林推举的人,早就是反对布哈林的人了,³⁰1927年时,他是共产国际驻德国共产党的代表,后来成为了1927年12月在广州失败了的共产党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共产国际里有传言说,“广州起义”应该成为对联共(布)十五大的一种特殊的礼物。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洛米纳泽和他的战友沙茨金批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纵容了“右倾”,后来又一直在培植它。事实上这是对作为共产国际首脑的布哈林的挑战,但是后者没有放过机会,提到了洛米纳泽在中国犯的错误。³¹虽然洛米纳泽的对立面不是没有根据地强调他的立场接近刚刚被粉碎的“联合反对派”的观点,但是他还是没有倒下去。从全会上争论的过程可以预料到,站在洛米纳泽背后的是斯大林本人。

洛米纳泽展示了共产国际各个支部日益增长的右倾危险,特别着重指出了德国共产党的局势。从他的观点看,拥护“右派”的人提出的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结盟是“机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消灭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提出的建议是不仅要打击这些分子,而且要打击“在德国党的基本领导干部和把它拖向机会主义道路的右派集团之间架起桥梁的中派”。事实上这里说的是德国共产党中站

在布哈林一边的人——克拉拉·蔡特金、阿图尔·埃韦特等人,这些人在1928年秋就被戴上了“调和派”的帽子。³²

洛米纳泽冲动的批评中有许多公正的东西:他表示了反对把欧洲无产阶级左转的提法绝对化,指出了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理论准备薄弱,但是他处于了骄傲的孤立地位。洛米纳泽也没有忽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他声明说,托姆斯基在工会国际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被“右派”用来抵制罢工斗争。托姆斯基立即对这个攻击做出了反应,声明说,主要的不是进行多少次罢工,而是它们有怎样的实际结果。

对曼努伊尔斯基的通报没有通过决定,讨论结束时有些个人的声明。洛米纳泽的进攻没有成功,但是在斯大林的战略中,这个进攻只不过是一次火力侦察,向聚集在一起的联共(布)中央委员表明,共产国际里并不是一切都平安无事。这为全会的第二天布哈林做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制造了一定的背景。

在七月中央全会上没有对共产国际纲领进行认真的讨论。由于纲领草案下面有两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斯大林和布哈林,这就让与会者失去了就原则问题进行争论的愿望。在中央全会上,布哈林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引起注意的有两个问题,面临着政治行情的变化,在这两个问题上,他明显地失去了自己的分析能力。第一是对欧洲的社会民主党采取强硬的和毫不妥协的路线,把共产党人自己的失败都归结为社会民主党的“卑劣”。第二是对战争危险的评价。布哈林坚持说,有苏联参加的战争已经逼近和不可避免,在这些战争之后,“我们将不得不书写另一个纲领”。1927年春,国际局势更加尖锐了,这使得党的机构在面临与“联合反对派”的决定性冲突中能够团结起来,这个事实导致的结果是,在苏联可以不断利用战争危险的思想维持一种氛围,好像它是处于被包围的堡垒中。这个政策有助于统治制度解决策略性任务,但同时最终导致了扭曲评价外部世界对苏联的态度,使得人们看不到德国纳粹执政之后欧洲局势发生的急剧变化。

1928年7月16日,俄共(布)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团认为必须要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一个完整的共产国际纲领。³³从外表上看,这是一个对布哈林有利的决定,是对“右派”放弃在七月中央全会上公开为自己的路线斗争的一种补偿。

好像在全会日程的中心问题上,也是布哈林和他的拥戴者的立场取得了胜利:重申了要保持新经济政策,首先是要保持发展中小个体农户、广泛利用和发展经济中的商品市场联系的方针。甚至也提高了(虽然不太多)粮食的收购价格。